

常云平 罗玲◎著

调适、规划与重建

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近代化



科学出版社

重庆师范大学学术研究基金资助

常云平 罗玲◎著

调适、规划与重建

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近代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抗战时期的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火中，一方面中华民族长期创造、积累的文明受到了无情的摧残，各类教育受到空前的破坏，其正常的发展轨迹被打乱；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对教育进行了诸多调整与改革，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使以大后方为中心的国统区教育，无论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国民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推动了战时中国教育与学术的发展进步，同时也改变了整个西部地区原有落后的教育面貌，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进步，也有利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总之，大后方作为战时中国教育的中心和民族复兴的摇篮，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调适、规划与重建：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近代化 / 常云平，罗玲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03-052458-4

I. ①调… II. ①常…②罗… III. ①教育史—研究—中国—1931-1945
IV. ① G5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834 号

责任编辑：任晓刚 / 责任校对：张凤琴

责任印制：张 倩 / 封面设计：楠行文化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字数：290 000

定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战时教育的时局背景	4
第一节 抗战的全面爆发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4
第二节 战时中国教育文化的中枢——教育部在陪都重庆	8
一、教育部迁往重庆	9
二、教育部在青木关的概况	11
第二章 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改革	13
第一节 战时教育方针的调整	13
一、战时教育思潮的形成及“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 的争论	13
二、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方针	17
第二节 抗日战争与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与变迁	20
一、战区学生指导处的设立	20
二、战区流亡师生的救济	24
三、战区学生贷金制与免费制的推行	29
四、教育讨论会之召集	33
第三节 战时教育管理体制调整	47
一、战区教师服务团的设置	47
二、学区制的创设	51
三、各级学校教科书的统一编印	55

第三章	抗日战争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57
第一节	大专院校内迁与高等教育的新布局	57
一、	流亡与迁徙——高等教育的内迁	58
二、	新规划与新布局	64
三、	高等院校创办或新设	71
四、	调适与提高——战时高等教育的整体进步	79
第二节	抗日战争与改革高等教育的措施	83
一、	大学先修班制度的创设	83
二、	高校联合招生的推行	86
三、	战时征调与战时服务	91
四、	提高教员待遇的努力	95
五、	院系的调整和课程设置的统一	96
第三节	战时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	101
一、	研究院所的扩充与招生规模的扩大	102
二、	奖励著作发明	118
第四节	抗日战争与留学生教育	119
一、	留学教育政策——从“管制留学”到“突破限制” 的转变	120
二、	留学国别及其概况	125
三、	教授境外的交流与互访	129
四、	文化设施的交流	131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与师范教育的近代化	133
第一节	抗日战争与高等师范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133
一、	国立师范学院的设置	133
二、	分区辅导辖区中等教育	136
三、	师范学院的教学与管理	138
四、	高等师范教育的成就与不足	141
第二节	抗日战争与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	143
一、	完善中等师范教育的努力	143
二、	国立师范学校的设置	147
三、	课程设置的完善	149

四、在职中等师资的培训	150
五、中等师范教育的成就与不足	151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与职业教育的推广	155
第一节 抗战以来发展职业教育的主要措施	155
一、厘定职业课程标准	155
二、推进西部省市的职业教育	156
三、国立职业学校的设置	158
四、职业补习教育的大力推行	159
第二节 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	161
第六章 抗日战争与中学教育的近代化	167
第一节 抗日战争与中学教育变革	167
一、国立中学的设立	168
二、公私立中学西迁或新建	173
第二节 抗战时期中学教育的发展概况	181
一、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学教育制度	182
二、战时的中学教学	184
第三节 抗日战争与中学教育的新发展	187
一、推进了西部地区中学教育的发展	191
二、带动了各级各类教育的整体进步	192
第七章 抗日战争与初等教育的近代化	195
第一节 义务教育为中心的国民教育	195
一、实施国民教育前的义务教育	195
二、国民教育制度的成立	197
三、国民教育制度的特点	198
四、国民教育办理成绩	199
第二节 救济与教化——战时难童教育	203
一、国民政府对儿童保育事业的努力	203
二、社会各界的难童救济	205
三、难童教养的实施	217

第八章	抗日战争与边疆教育的近代化	226
第一节	推广边疆教育的方针政策及措施	227
一、	边疆教育方针及政策	227
二、	推行边疆教育的举措	229
三、	边疆考察热潮及边疆研究的兴起	233
第二节	边疆教育办理情况	235
一、	各级国立学校的设立	236
二、	边疆各省边疆教育办理情形	243
第九章	抗日战争与社会教育的近代化	250
第一节	抗日战争与民众教育的广泛施行	250
一、	各级民众教育馆的广泛设置	250
二、	社会教育扩大运动周	253
三、	普通科学教育的推进	253
四、	图书馆、博物馆的维持	254
五、	美术音乐与戏剧教育	255
六、	补习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255
第二节	电化教育的推行	258
一、	电化教育政策及施教机构	259
二、	电化教育器材设备	260
三、	电化教育人员训练	262
第十章	抗战时期的教育学术团体走向近代化	264
一、	战时主要教育学术团体	264
二、	十二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的成立	272
三、	教育学术团体的特点	274
第十一章	抗日根据地教育概况	277
第一节	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方针	277
第二节	根据地的各类教育概况	281
一、	卓有成效干部教育	281
二、	蓬勃兴起的儿童教育	289

三、灵活多样的群众教育	292
第三节 抗日根据地教育的特点	295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的教育家	298
第一节 战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	298
第二节 主掌中央大学十年之久的校长罗家伦	299
第三节 “南开先生”张伯苓	301
第四节 “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302
第五节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304
第六节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305
第七节 “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晏阳初	307
结语 抗日战争与教育事业的近代化	309
后记	325

绪 论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沿海、沿江各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的摧残与破坏。为了维持教育事业，救济失学青年，增进抗战实力，国民政府在教育方面也适应战时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采取了各种措施，从而使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大的损失。国民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相信“抗战”、“建国”应同时并进，而教育为建国之基础，故虽在艰难困苦之中，仍坚忍奋发，辛苦维持。全面抗战期间，各级教育“并未停止其进步，俱能逐渐发展”。国民政府订定各级教育制度，增加教育经费，除了调整规划高等教育、整顿大学外，还致力于扩大职业教育，发展师范教育，推进边疆教育，扩充社会教育，推行义务教育，注重国民及体育教育，提倡科学研究等工作，使战时各级各类教育“均能同时并进，具有相当成绩”，可称为“实施新教育以来最有成效之时期”。^①

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在战火中，中华民族长期创造、积累的文明受到了无情地摧残，中国教育亦承载了种种磨难与考验，其正常的发展轨迹也由此被打乱。基于保存中国教育学脉和战乱时期对教育进行必要调整的考虑，上百所高等院校及大量中等学校千里跋涉，迁至中国的后方腹地，与各地方学校一起在抗日战火中弦歌不辍，辛勤育才，为国求贤。从总体上看，全面抗战时期，

^①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教育通讯月刊》1947年第9期。

中国教育并未停止探索前进的步伐，反而在很短时间内得以恢复，中国的教育也由此在战争环境下得以保全和发展。许多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内迁，客观上促使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在广阔的时间、空间上进行了成功的转移和传播，中国教育的布局亦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西部省份的各类学校数量迅速增加，这些省份的教育面貌也由此焕然一新。大量教育科技人才的流动、科学理念的注入，使得大后方地区的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闭塞、落后的面貌开始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抗战期间内迁各校在传播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培养边疆开发与建设所急需人才，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等方面功不可没，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为中华民族抗战事业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抗战时期教育的考察，应看做是一次“对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发展历程所做的一种探讨”^①。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教育作为一个专业化社会组织，与当地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往往交互发生作用，在这一功能转化过程中，教育并非仅仅单向地依赖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反过来，教育又因为自身能够提供大量高水平人才，营造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而为当地政治、经济与文化服务。

作为中国教育史的一个特殊阶段，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在抗敌御侮的艰难环境之下，为中国近代文化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它不仅保证了中华民族在中日双方争夺文化教育战线方面取得主动权，保证了同日本军国主义斗争到最后胜利的人才资本，而且在安定人心、稳定后方并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方面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发展，是在传统与现代、国际化与民族化碰撞与选择的综合作用与影响之下，通过从理念层面到实践操作层面这一不断变革的发展过程而形成的历史结果和自然产物。随着战时教育机构的复杂化、多样化，

^①（加）许美德：《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51 页。

重心逐渐由关于理念、课程的研究转向组织模式和管理的研究。

目前，战时教育专题研究仍较为薄弱，以校史为主题的著作及抗战教育史料性成果占据着较大的比重，而作为专章系统介绍抗战时期教育的专著却寥若晨星。虽多有学者涉足其中，但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较少，部分重要历史事件有欠翔实，史料亦有待挖掘、补充。从成果形式来看，多以方志、史志、文史资料、回忆录等形式出现，虽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忠实客观地还原了历史，但由于过多局限于叙述特定区域教育之大端，大部分著作仍局限于“一本专著几篇文章”式的概略性介绍，“小而全”的叙事体例结构尚难以反映特定时期宏观背景之下教育的发展全貌，加之流通渠道极为有限并缺乏较为深入的“史论结合”式研究，这也使得各类专题史研究在思想性、学术性、评论性等方面略显阙如。此外，由于更多强调按时间体例进行全面叙述，系统研究较为鲜见，即便有也是混杂于教育史的教科书或中国教育史、民国教育史、抗战史等专门史著述。

战时教育作为抗战史和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战时教育研究，可以从一个更为直观的角度反映出战时教育的变迁与发展趋势。在研究中，我们特别注重对战时各类教育局部性、暂时性、延续性等特点的挖掘，关注众多大专院校及中等院校大规模内迁大后方所带来的变化及其区域布局调整；关注战时中国教育所经历的“跨越式”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后方教育的落后面貌，为全国教育区域协调创造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一事实，以此来探讨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抗战时期中国教育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历史的印迹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烟消云散，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及区域社会合作的不断深入，反而愈加显露出对于抗战时期教育流变与绵延研究的重要意义。分析研究战时中国各级各类教育流变与绵延的历史变迁历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清晰地窥见现代民族、国家与教育之间复杂的关联和互动关系，较好地发挥以史为鉴的研究功能，对加快当前教育发展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第一章 战时教育的时局背景

第一节 抗战的全面爆发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全面抗战后，沿海、沿江各重要城市相继沦陷。1937年10月下旬后，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军队逐渐处于不利局面，距离上海战场260千米外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面临严重威胁，为保证国民政府安全，国民党决定迁都。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提出迁都重庆。在11月16日召开国防最高会议上，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文官、参军、主计三处职员登上永绥舰，起锚溯长江西进，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和通电，通电表示：“国民政府为适应战略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业于本日率中央各机关驻重庆……此项措施，在使中枢不受敌人暴力的威胁，贯彻我国持久抗战的主旨，以打破日寇速战速决之迷梦。国府迁渝以后，不唯我前方抗战军事仍本既定方针坚决进行，绝无牵动，且中枢移驻腹地，首脑臻于安全，则耳目手足更得发挥充分之效用，就整个抗战大计而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①《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内容如下：

^①《国府迁渝通电（1937年11月20日）》，章伯峰、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三卷·政治（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28页。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陷落，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的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略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为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迺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为我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①

国府迁渝也得到四川及重庆各界大力支持与拥护。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后，省府当局迅即作出响应。四川省主席刘湘特函电《上蒋委员长呈文》，对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表示“竭诚欢迎”，电文说：“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战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负终自我操。不特可得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 7000 万人，翘首欢迎。”^②“四川地大物博，被称为复兴民族根据地。期望既大，责任綦重。今者寇已深矣，沿海交通被敌封锁，接近战区，日遭轰炸。四塞之

① 蒋文澜：《中国抗日战争实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38页。

② 刘湘：《四川后方国防基本建设大纲》，1937年。

地如西蜀者，举全国之力以开发之，在今日实为急切要图。”^①“七七事变”后，重庆成立了“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该会“以团结努力，一心一德，各尽所能，各负其责为宗旨”，“以援我将士，迎头抗敌”为目标，成为当年重庆颇有影响的民间政治团体。该会得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反应热烈。1937年11月28日，该会发表了《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对政府当局迁驻重庆的非常措置，表示衷心的拥护。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向我进攻，企图袭击首都，迫我订城下之盟。我贤明的中央当局为策应万全计，已将国民政府移来重庆。这种非常措置和奋斗精神，值得我全体民众的竭诚拥护和热烈欢迎！”^②

1937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西迁人员全部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府址设在曾家岩原重庆高级工业中学内。12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电称“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随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于12月6日在重庆召开联系会，亦决定通告各级党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开始办公。在林森一行西迁后，在南京的党政军机关也相继转移。其中，军事委员会指挥机关、行政院各部大部曾留驻武汉办公，直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迁移重庆。林森抵渝后，国民政府各部门及机构相关人员，水陆兼程，经武汉、宜昌，分头迁往重庆。到1938年，各民间团体、新闻单位、外国在华机构等大批机构也蜂拥重庆。重庆市民及相关团体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积极的支持，纷纷让房、让地。所有内迁单位，大都是利用原重庆各界公私房舍，稍加修葺，匆匆进驻。国民政府所属中央各行政部门的办公机构，集中迁建于重庆市区的上清寺、曾家岩及大溪沟约两平方千米的地界内。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就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1939年5月5

①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139页。

② 《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工作概述》，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争动员》，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年。

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行政院特别市。1940年9月将重庆定为陪都，以表示抗战的决心和必胜信念。其令云：“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綰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渝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僉同，兹特明令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字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藉慰輿情，而彰懋典！”^①

国民政府自1937年10月，迁都重庆，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还都南京，其间8年，重庆不仅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活动的中心，也是盟军中国战区的司令部和指挥中心，成为国际知名大都市。它在支持长期艰辛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并由一座古老的军事城堡一跃而发展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指挥中枢，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发挥着首脑、中枢和灵魂的重要作用。在10年陪都岁月里，重庆的国民政府成了中华民国岿然不屈的象征。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起点和契机，逐渐奠定了以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康等省为区域范围的抗战大后方，也加速了四川和大后方的近代化进程。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和确定以大西南为抗战大后方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大西南在战略上具有典型的易守难攻的特点，具有无可争议的国防地理优势。其次，大西南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虽多为山地，但气候宜人，雨量充沛，江河众多，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农业兴旺。丰富的自然资源使西南地区具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空间，成为持久抗战不可缺少的条件。再次，西南各省具有良好的人文条件。西南地区不仅地域广阔，物产丰富，而且人口众多，人民勤劳，仅四川省即达50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使之具有充分的兵源和劳动

^①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68—69页。

力。^①基于以上原因，自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对把西南建为抗战大后方的认识越来越明确。1935年3月4日，蒋介石在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扩大纪念周会上讲演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以说为各省之冠。”^②8月11日，蒋介石在峨眉山集训团上对西南各级干部说：“只要大家发扬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之光荣，以川滇黔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一心一意，为国牺牲，使我们中华民族永远安国昌隆，巍然屹立于世界。”还表示“我敢说，我们本部十八省，哪怕失去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③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时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④两天后，蒋介石在另一次讲演中又强调：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政要人多次到四川各省考察，着手建设西南。也正是因为如此，蒋介石在1937年10月29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提出迁都重庆时说，国民政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早已预定。

第二节 战时中国教育文化的中枢 ——教育部在陪都重庆

国民政府教育部是战时各级教育文化的指导中心，制订了以“教育

① 黄华文：《抗日战争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7页。

②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1年，第10页。

③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1年，第12页。

④ 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为立国之本”的战时各级教育方针，对促进战时中国文化教育激励机制的形成，乃至抗战建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教育部在领导陪都和全国各地的抗战文化教育运动中，聚集、培养建国人才，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战时大后方及全国教育界做了较大贡献。

一、教育部迁往重庆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由南京迁至武汉，至1938年11月武汉失守前夕再迁至战时首都重庆。此后在渝8年期间，先驻重庆师范学院，即今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内，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战略大轰炸后，乃迁至西郊的“国民政府中央机关迁建区”内的青木关温泉寺办公。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教育部才撤离青木关东返。国民政府教育部内迁重庆，致使重庆在全国教育文化的核心地位不可忽略。

抗战期间教育部长为陈立夫，常务次长余井塘，政务次长顾毓琇。1945年部长由朱家骅接任；1944年8月，顾毓琇调任中央大学校长后，常务次长改由朱经农接任。内设6个司20个委员会，分别为总务司、高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国民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蒙藏教育司。20个委员会前后略有差别，1940年调整之后的情况是：（1）学术审议委员会。（2）训导委员会。（3）国民体育委员会。（4）各学校员生费用管理委员会。（5）国民教育辅导研究委员会。（6）审核委员会。（7）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8）国术教材编审委员会。（9）医学教育委员会。（10）侨民教育委员会。（11）美术教育委员会。（12）国语教育委员会。（13）电化教育委员会。（14）边疆教育委员会。（15）农业教育委员会。（16）工业教育委员会。（17）史地教育委员会。（18）音乐教育委员会。（19）奖学金管理委员会。（20）战区学生指导委员会。

在教育部6司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国民教育司和社会教育司。根据教育部组织法，国民教育司掌管小学教育、失学民众教育、幼稚园